

# “公众考古学”散论

张颖岚

随着考古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密，关于公众考古学的学术探讨与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以至于Public Archaeology到底该翻译成“公众考古学”，还是“公共考古学”等问题，学者们也见仁见智，发表了许多很好的见解。

考古学科的诞生以及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都与它所凭依的时代与社会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公共考古”抑或“公众考古”这两种不同的译法，所反映的正是学界的不同倾向、视野与关注点。换句话说，这两种译法虽然在中文语境中各有侧重，但作为考古学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言，则是一体两面，实际上是考古学科面向社会需求在不同维度和层面上的响应。其中，“公共”是处理两者关系的核心与基础，“公众”则是处理两者关系过程中的视角与面向。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公众考古实际上是考古学科“公共性”这一思维基点的行动体现方式与价值实现路径，而如何把握好考古学与社会需求二者间的平衡，则是需要我们不断辨析思考的。

## 学术纯洁性与社会功用性的平衡

考古学作为兼具人文背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的一门实证性学科，其社会功用性始终是被赋予的一项重要责任。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伊始，即在殷墟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其目的不仅在于推动学界由“疑古”走向“信古”，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通过民族文化寻根来提振时人抗击外侮的信心与勇气。近年来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也使那些曾经不为人所知的地点，迅速成为游客纷至沓来的热门景点，这也可以算是考古学社会功用性的另一种表现。

不过，如何把握好考古学自身的学术纯洁性与外界所期望的社会功用性二者间的平衡，对于置身其中的学者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比较典型的现象，就是在各地经常出现的“祖陵”“故里”“名人墓”之争。一些地方政府看重考古发掘研究所产生的“文化资源”汇聚优势，于是不遗余力地推动那些能够给当地带来即时利益的考古活动，并且当考古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之后，又以保护与展示这些考古发现为由，开始热衷于大兴土木进行场馆建设，并大张旗鼓地“打造”宣传。当然，如果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整个过程是在立足学术、尊重科学、严谨而节制的前提下进行的，地方政府的这些行为倒也无可厚非。但当最终目标被设定为“短平快”的名利收益时，考古工作就成为服务于这一目标的手段，考古学家也就会被自觉、不自觉地裹挟于这种趋势之中。

当然，如果考古学的学术纯洁性与社会功用性二者间达到了一种相对平衡，那么不仅可以推动考古学自身的发展，也可以发挥出考古学科对当代社会的更大作用，这种正反馈又会成为促进考古学未来发展的积极力量。但是如果学术纯洁性与社会功用性之间的天平偏向后者，具有一定功利倾向的预设性结论就有可能左右考古学自身的探索与研究，影响学者们的学术判断。尽管考古学在短期内可能会因为满足了社会“公共”需求而获得了更多的“公众”关注，但其长期效果还是有待观察的。

## 权威话语权与公众参与权的平衡

在考古遗址的保护利用过程中会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往往会出现权威话语权与公众参与权之争。如果我们将考古过程划分为发掘研究、保护利用这两个大的阶段，大体来看，在前面一个阶段的专业性要求更强一些，考古工作者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与决策权，专业领域以外各方的参与权重并不太高。在保护利用阶段，考古工作者虽然仍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保护、规划、管理、旅游等其他领域专家也参与其中并被赋予相应的话语权，政府行政官员、当地居民、投资方以及媒体、使用方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也都有了参与的权利，并且在某些环节还有可能左右决策的方向。因此，无论是在考古的发掘研究过程，还是在遗址的保护利用环节，考古工作者及其考古活动所涉及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都会不同程度地出现权威话语权和公众参与权的分歧与冲突、协商与合作。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各方对考古活动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就需要我們既坚守考古专业的学术底线，也要以“公共”考古的公众性，充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解决彼此之间“非合作博弈”的困境。

此外，在考古的“发掘研究”阶段也存在专家权威话语权与公众参与权之间的适应与调整。比如说，在早期殖民时代，欧洲的殖民者对美洲原住民的遗址和墓葬进行了大量的非专业性考古发掘，据不完全统计，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仅美国印第安人的墓葬遗骸，美国各级博物馆和其他机构以及私人收藏团体等就收存有30万至250万具之多，而那些经过考古发掘出土或者民族学调查收集的美洲原住民物质遗产，也被作为展品在博物馆、展览馆等不同的场合陈列展出，引起了原住民的抵触与反对，认为这种展示活动是对他们民族圣物的不敬，还会消减这些崇拜物品的神力。随着美洲原住民公众参与权和话语权的增加，为了保护原住民的墓葬、遗骨、造物等，美国在1990年正式立法并颁布了《美国原住民墓葬保护与返还法案》，对考古发掘研究、保护利用中的相关行为予以规范。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公众参与影响专业领域决策的案例。

## 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

考古学的“公共性”既是学科产生的背景与基础，也是其进一步发展的社会需求。如前所述，在考古工作的不同阶段，往往会出现因共同的利益诉求而聚合在一起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这些群体之间因价值取向的不同而易出现分歧与矛盾。但是当我们在辨析这些矛盾对立关系时，首先还是要厘清这些利益诉求的性质，即哪些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哪些是代表一部分人的“个体利益”。当然，在分析何为“公共利益”，何为“个体利益”时，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动态的辩证视角。比如说，当涉及某地一处考古遗址的“去”与“留”问题时，尽管对于当地而言，选择不再保留遗址可以延续既有的土地开发与城市发展规划，有利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属于当地的“公共利益”。但对于国家而言，选择保留考古遗址则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文化需求，是属于更高层面的“公共利益”，如果将这两个利益相关方放在一起考虑时，我们就会发现，对于当地而言的“公共利益”，在与更为宏观的国家“公共利益”进行比较、权衡时，则是带有地方本位主义色彩的“个体利益”。这种动态的辩证视角，是在我们思考考古学“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冲突时需要重点关注的。

我国的很多考古遗址叠压于现代人类活动区域之下，在遗址区域及其周边现在都有大量的当地居民在生产、生活。这些遗址的存在，既为所在地带来了辉煌，也造成了潜在的压力，尤其是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不断增长，考古遗址的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有些地方基于一时一地的考虑，过分强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共利益”需求，而忽视了更高层面的文化“公共利益”，曾给考古遗址造成了破坏。当然，近年来随着各地“考古前置”政策的逐步落地，考古工作因其所具有的突出社会、学术价值与国家文化“公共利益”而被置于更为优先的层面，对于化解不同层面“公共利益”间的冲突，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考古发掘保护工作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失衡问题。

但我们还应当看到，考古遗址的专业性保护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遗址区内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生产，需要我们从考古学的“公共性”视角出发，探索一种“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协调发展的保护新思路。

## 考古“热话题”与“冷思考”的平衡

近年来，关于考古新发现的话题成为各大媒体争先报道的新闻热点，一些面向大众的媒体传播形式也层出不穷，成为公众获取考古学知识的重要途径。诚然，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文物考古知识传播与共享，是考古学“公共性”的一种体现形式与实现方式，也是今天考古学“走出象牙塔”，获得公众关注与社会支持的有效路径。但是在考古“热话题”的同时，我们的确还是需要有一些“冷思考”。譬如说，一些媒体往往更热衷于报道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哪些“奇珍异宝”，或者与历史传说中的某些人物、事件、神秘王国有着怎样的联系等；还有一些地方为了带动旅游、打造文化亮点，也会给一些尚处于学术研究探索阶段的考古发现直接贴上“最早”“唯一”等标签。这些在考古学公众传播中所出现的信息真实性与客观性扭曲的现象，是值得我们静下心来思考的，考古知识在面向公众的知识生产与信息传播过程中，是如何被媒体和公众所选择的？考古学者在共享考古成果的过程中，如何既能满足公众的求知需求，又不被他们的“猎奇”心理所左右与影响？

然而，也有学者通过分析指出，媒体作为向公众介绍考古发掘进展、传播考古知识、宣传推广成果内容的“中间人”，在选择报道内容时有较大的话语权和自主权，他们会根据专家的解读和介绍，基于传播学的理论和知识、结合社会热点和受众需求进行有所侧重的信息选择，其中的一些不当表述容易造成负面的影响。比如，用“挖宝”来比喻考古发掘，可能会造成误导，使公众认为考古就等同于挖宝；还有一些报道为了增加吸引力，会用另一种说法转述专家的解读，最终呈现给公众的考古信息是经过媒体过滤与加工的，因此有可能使所传达的考古信息失去了严谨和准确，让公众产生误解。在这一过程中，考古学者有必要及时向公众传递科学、准确、严谨的信息，以纠正媒体的信息传播偏差。

除了传统媒体以外，近年来也出现了自媒体等一种新媒体形式。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的自媒体，“内容为王”这一准则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大众对远古历史的好奇心和考古新发现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各类自媒体也纷纷涌入文物考古这个领域之中，试图紧跟一些热点考古资讯，提高自媒体的观看数、点击量与粉丝数量。如果这些自媒体是向公众普及科学、准确的考古学知识，倒也不失为一种考古学走向公众的有效途径。但是自媒体为了追求观看量的快速增长，会有意无意地夸大或扭曲事实，使考古信息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受损，或者将严谨的考古学过于娱乐化，这是公众考古信息传播中要警惕的一种新趋势。

综上所述，无论是“公众考古学”，还是“公共考古学”，在处理考古学与社会需求二者关系时，既要“清心守正”，坚持自身独立性 with 学术纯洁性，履行学科被赋予的历史使命；又要“兼济天下”，思考自身的公共价值和社会意义，承担起助力社会进步发展的责任。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 交流

# 从打制石器绘图演变谈绘图规范

杨玉华

## 旧石器制图学的发展和演进

石制品线图是旧石器研究者记录和分析打制石器制作方法的手段之一，与文字、照片和图表等文化信息同等重要，其根本原则是客观地再现石制品本身特征。

旧石器绘图的发展过程与旧石器的发现和研究是相伴相生的。法国是世界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发展地，其旧石器绘图历经长期的发展过程。19世纪60年代，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家波尔特(1788—1868)所发表的线图注重客观再现石制品的真实面貌。这个阶段的旧石器绘图主要是为了展示石制品，并推测其使用方式，并没有特别表现出石制品的技术特征。（图1）

20世纪70年代以前，从法国《史前学会通讯》发表的论文和报告来看，文章中的石制品线图逐步精细化和规范化，这一时期石制品绘图以展示、划分石制品类型为主要目的，代表作是博尔德(1877—1961)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类型学》。之后的学者捷克西耶继承了他说，主张在实验中了解其加工技术，注重了解石制品破裂面的方向及打击的先后顺序所产生的形态特征。

这一时期的旧石器研究者在进行时有意识地选择典型石器标本，赋予标本具体的名字，比如：石片、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石斧等。所绘制的石制品线图轮廓与破裂面范围清楚、准确，同心波纹和放射线表现比较规矩，图像明暗对比和谐。（图2）

20世纪70年代，法国旧石器技术分析方法开始发展并形成体系。以旧石器学者杜瓦为代表的技术分析法，在《史前石器工业动态和结构性绘图的概论》一书中系统地讨论了绘图的范围和方法，并倡导绘制“技术分析图”，得到后来者的追随和不断完善。技术分析图只绘制石制品的轮廓和脊线，用箭头和数字来表达打制过程，是对传统图像的一种简化。（图3）

法国旧石器图像学对我国和日本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青年学者山中一郎、竹岗俊树在学习法国旧石器绘制方法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进步，抛弃了以明暗来表现石制品的真实面貌，完全以线为表现形式，表述石制品在打制过程中形成的破裂面之间的打破关系，以及诸如打击点、放射线、同心波纹等元素，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日本特点的石制品“实测图”。（图4）

大量考古报告证明，我国的旧石器绘图大体以类型学为基础，以法国旧石器传统绘图方法为手段（图5）。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提高和规范考古发掘、研究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专家编写了《考古工作手册》，其中着重介绍了打制石器的绘制方法和绘图工具的使用。由张孝光绘制的石器图例，基本代表了当时我国旧石器线图的最高水平。

## 类型学基础下的旧石器制图规范和要求

就目前所出现的石制品线图看，国内仍然是以类型学为基础，只是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也有少量考古报告采用简单轮廓线或者使用照片结合符号、箭头标注等方法来说明。笔者长期从事考古绘图工作，有一些的绘图经验。目前国内从事考古绘图的专业工作者大多会有绘制石

## 学术动态

# 中华文明与史前玉器起源研究的新进展

鲍丽娟 梁峻豪

玉器，同时推动无损检测技术的使用，通过科学数据印证玉器材料的跨区域流动、制作工艺的技术传承等关键问题，进而加强对玉器在文明起源中承载的资源控制、技术传播等社会功能的阐释。

## 玉石器研究方法论问题

玉石器的系统研究由多个具体分支组成，杜金鹏、黄建秋、谈晟广等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对玉石器研究方法论发表见解。首先，从考古角度出发，玉石器研究对象分为器物本体及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前者包括玉料来源、制作技术、器物形制等内容，后者则需回归玉器出土空间、所处时代、伴出器类及使用者身份等问题展开探讨。其次，在科技考古方法的支持下，玉石器研究与考古学“器物见人”的目标更进一步。如借助超景深显微镜精密观察玉器的制作与使用痕迹，可以复原人类身体层面的行为动作。再如结合分子人类学研究，探索玉器传播背后的人群流动现象成为可能。最后，从艺术史视角来看，玉器形制、纹饰等视觉特征象征着文化、礼仪及信仰的精神化，史前中国存在以精神性、社会性与政治性为核心的玉器时代，有别于石器—铜器—铁器时代的三段论发展框架。

##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问题

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人类社会为适应自然生态与气候变化，在革新技术、生产活动、生存策略等方面发生系统性变化。李有骞、庄丽娜分别以黑龙江饶河小南山、河北康保兴隆遗址作为东北、华北地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研究案例。博林暖期(15~13ka BP)，小南山第一期文化遗存出现半地穴房址、炊煮平底陶罐、伐木磨刀石斧等季节性定居的文化因素。进入全新世早期(11~8ka BP)，小南山文化有陶窑判定居模式随气候回暖而稳固加强，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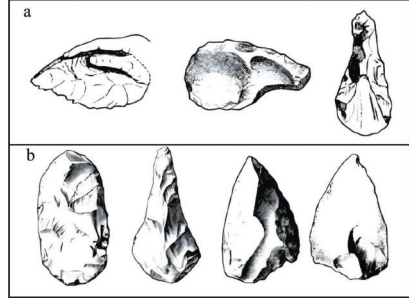


图1 20世纪前以展示为目的的旧石器绘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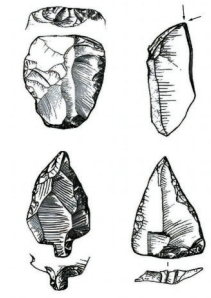


图2 20世纪60年代以类型学方法为基础绘制的旧石器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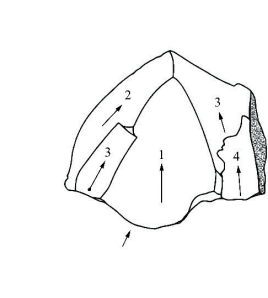


图3 技术分析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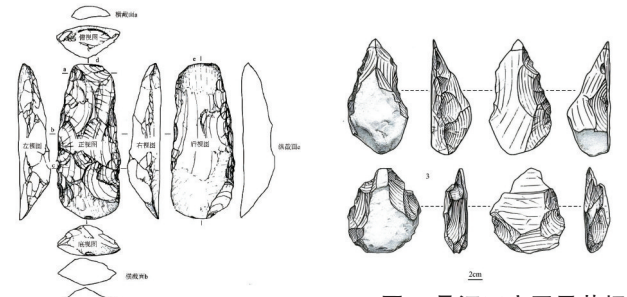


图4 日本的旧石器线图

图5 丹江口库区果茶场旧石器遗址出土的石器线图

打破关系，每个破裂面之间形成棱线，破裂面内部形成分布不均的同心波纹线，破裂面边缘形成放射线形态，打击位置被称为打击点，还有半锥体、原始自然面等元素，这些元素都是需要认真对待和细致描绘的。

**绘制方法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石制品绘制过程中，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原始台面一般采用撒点的方式，或者短线加撒点相结合的方式绘制。较粗的实线用来描绘石器边缘轮廓，使用纤细一些的曲线绘制出剥离面之间的棱线范围，然后再具体刻画破裂面内部的打击点、放射线和同心波，不仅要注意破裂面之间的先后顺序和打破关系，还要注意其同心波弧线的起伏形态和方向，防止出现方向不同或相反的弧线。同时要看清楚打击点的位置和打击点范围。另外小型工具如刮削器刀部的修理疤痕同样需要描绘得清晰细致而有序。破裂面内部的放射线则需要用直线绘制，同时应注意用线的组合和虚实。另一方面，有些石制品仍然保留着原始自然面，在描绘时，一般采用短小的曲线加撒点的方法表现其真实面貌和质感，有的自然面较为平滑可使用均匀撒点的方法，一般并不使用留白的方式，避免画面单调产生空洞感。而诸如石锤、砍砸器等大型打制石器，普遍采用锤击或摔击方法，产生的破裂面较大，破裂面内部的同心波纹一般较直且弧度不太明显，在描绘时主要采用近乎直线的曲线来表现，有时也可以采用一些短而直的线段来表现其粗糙的质感。这种大型工具的边缘因使用常留丁痕迹，描绘时采用短曲线，有时配合一些粗糙的点来表现其特征，这些都需要制图者认真观察和研究。

通过以上的方法，我们在绘制石制品时才能能够做到有的放矢，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虽然这种绘图方法有了一定的规范 and 标准，但是不同的对象都有其特殊性，还需要绘制者了解研究者的意图，根据不同对象认真观察和分析，最终决定选用合适的绘图方式，做到灵活运用，防止生搬硬套，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成长。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 中华文明与史前玉器起源研究的新进展

普遍出土平底陶器、磨制石器及非实用性的玉器。与此大致同期的兴隆遗址旧—新石器过渡遗存包括陶器、细石器打制石核、石片、工具以及磨盘、磨棒等磨制石器类，是研究华北地区有陶采集狩猎文化的理想样本。对比来看，两个遗址均存在陶器发明、石器工具精细等旧—新石器过渡的普遍特征，但二者因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的复杂性，在资源利用、栖居形态上形成各有差异的过渡模式，体现出中国新石器化进程的区域多样性。

## 玉文化起源问题

玉文化起源是史前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里程碑式发展。赵朝洪、孙新民、秦丰实、邓聪等学者就玉文化定义、产生与传播展开讨论。首先，玉文化可分为古玉（石之美）与软玉（真玉）文化两个概念。古玉的出现可追溯至距今5万年前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而真玉文化在东北亚距今1万年以前成熟。其次，物质、技术与观念是玉文化产生的条件。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出土距今9000年前的玉器，再度为采集渔猎背景下真玉文化的发源与传播提供了讨论空间。立足东北亚视野，中国小南山、兴隆洼、俄罗斯鬼门洞、日本共荣B、桑野遗址均出土玉玦、匕形饰、管饰的玉器组合，同时在出土玉玦缺口发现砂绳切割痕迹，这体现出东北亚用玉观念与制玉工艺的共性。此外，中原地区绿松石的独立起源是玉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距今9000~8000年前，贾湖遗址出土千余粒绿松石饰品，是与软玉同时诞生的另一美石系统。软玉与绿松石的共生发展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审美观念与信仰体系。

与会学者聚焦馆藏玉器与出土玉器研究，探讨范围横跨多地区，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未来有必要以更广阔的世界性视野，将史前玉文化研究引向更深的层次。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